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9年9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9[I](续)

一般性辩论

萨摩亚独立国总理图伊莱帕·塞莱莱·马列莱高伊阁下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萨摩亚独立国总理的讲话。

萨摩亚独立国总理马列莱高伊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很高兴欢迎萨摩亚独立国总理图伊莱帕·塞莱莱·马列莱高伊阁下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马列莱高伊先生(萨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你是在历史性时刻和最富挑战性的时候担任主席职务的。我们最热烈地祝贺你。萨摩亚欢迎你的领导,并保证将全力支持你和纳米比亚。

这个大会对太平洋是格外令人高兴的大会:我们中间来了3个新的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这三个国家具有古老的传统,长期致力于政治独立,它们每一个国家都代表了我们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它们使普遍性的目标更加现实,因为我知道,它们的贡献必将丰富联合国的工作。我谨以我国的名义向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等国政府表示最热烈致意。

首先,请允许我对我们秘书长的领导表示赞赏,感谢

联合国所做的卓越工作。联合国在极为不利和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取得了成就,因而是卓越的。

20世纪的特点是始终贯穿着暴力和悲剧。千百人死于世界各地无数的冲突。还有千百万人死于贫困和疾病。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瞻前顾后,发人深省。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事和不安全的世界。问题的广度和复杂性令人忧虑,在某些方面似乎令人难以招架。对通常的期望都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卷入残酷战争的人太多。基本的人的需要和权利被剥夺。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秘书长的报告。在这里,需要确认的很多,在很多地方需要检验我们自己对事件和趋势的看法:秘书长直截了当而且我认为是正确的提醒我们注意主权在我们当代的共同利益方面的地位,并问我们应如何和以什么手段捍卫这一共同利益。这些问题归结到问题的中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确定联合国在下个千年的作用。当然会存在看法的分歧。联合国本身近来的经验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是,存在着需要认真和紧急应付的挑战。我同意秘书长关于至关重要确定国际行动和干预的明确标准的看法。联合国具有多边的环境,最适合确定这些标准。正是联合国肩负处理干预的全球理想。但是,曾经有过失败,曾经出现过无能为力情况。

现在,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查这些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我们在探查时必须平衡相互竞争的权利和价值观。联合国的根本实质因此而明朗化:我们需要确保联合国能够在新的世纪里有效工作,确保我们的联合国

由于承诺和改革而得到加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牢记和平、发展和人权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我们忽视某一项,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其他各项,尽管和平是我们共同利益——事实上是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最终尺度。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当前改革安全理事会努力进入更决定性阶段的时候了。问题很清楚,而且我们一段时间以来观点很明确:争论的观点现在又被拿出来加以重复或重新包装。需要实质性的变革:目前的结构没有反映今天的事实和实际;并且因为不平衡和不平等而受到妨碍。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应该增加:我们过去曾经说过,日本应该成为常任理事会国。应该作出这样的规定。

我们欣赏对安理会工作方法所作的程序性改变,我们鼓励作出更多这样的改变。在没有对一个类别给予适当关注的情况下寻求解决一个类别代表性不公平是不可取的。我们也赞成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必须全面、必须整体解决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否决权问题的看法。否决权是个核心问题,必须从当前改革的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认为确有理由限制否决权,使之只限于《宪章》第七章的事项。

萨摩亚完全支持加强并使联合国现代化的持续努力。改革措施应规定早日严肃审查区域集团问题。目前的这种安排与其说是代表目前情况,不如说是代表过去的情况。必须改变这种安排,以体现自然地理情况,并确保分区域的公平地域分配。

应纠正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算在其地理地区外的反常现象。它们是亚洲集团南太平洋分区域的一个自然部分。萨摩亚支持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本届会议期间对进行这种区域改变的呼吁。联合国的改革应反映这个问题,在改革安全理事会结构和成员资格方面也应考虑到这个问题。

明年,当我们逐渐就千年大会的做法达成协议时,我国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应侧重人类在下个世纪可能面对的重大全球挑战。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除了战争和冲突,自然灾害也是一个重大和主要的全球挑战。自然灾害仍对人类生命和国家经济构成严重威胁。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自然灾害在各地广泛泛滥而不受任何边界的限制。此时,我们尤其想到在希腊、土耳其、台湾、美国和巴哈马那些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社区。

世界在1990年代就象在1960年代一样经历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就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而言,1998

年是历史纪录上最糟的一年。但是,我们失望地从秘书长报告中得知,仅在过去5年,紧急援助资金就下降了40%。对巴哈马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来说,这些“百年不遇”的事件正在以惊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出现。它们真正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弗洛伊德飓风是本世纪测定的第四大飓风。

我国也没有幸免于难。我们只能感谢我们的邻国和传统的朋友在灾难时刻如此迅速地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的各太平洋邻国即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在出现影响我们太平洋区域的灾害中,继续站在紧急救援或恢复努力的最前线。远离太平洋的国家,例如欧洲联盟成员国也很慷慨。甚至发展中国家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对我们的国家造成破坏的大灾害中,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本身也经常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直在这些困难时刻慷慨地援助我国。

上星期,中国庆祝了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萨摩亚和其他国家一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达到历史上这一重要的里程碑。

当务之急是确定可以采取的预防行动,尤其是对那些小国和易受伤害的国家。利用卫星搜集数据的先进预警系统和因特网传播数据将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培训和提高能力。需要更加努力,为易出现灾害国家制订应急计划和其他准备措施。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所有各级进行积极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尤其赞成最大限度的利用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所有国家,尤其是最易受伤害国家,继续这一工作至关重要。

萨摩亚支持对东帝汶暴行表示的愤怒。这些是对原则和政府职责的违反,是对无辜和手无寸铁者的侵犯。东帝汶的真正教训在于人民争取自由的志向最终将取得胜利。他们是不可能永远被镇压下去的。的确,他们通过选举表达的选择非常明确。联合国在确保秩序和安全的同时最能够捍卫权利和自由,这也是东帝汶的经验。

已经部署多国部队使我们感到宽慰,我们赞赏包括我们的南太平洋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关键国家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萨摩亚特别感谢澳大利亚明确而坚定地承担起领导职责。

我已经提到的违反情况使国际社会更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完成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必须使那些犯下这些不可接受暴力行为和罪行的人作出交代。萨摩亚能够对制订《罗马规约》作出贡献。我们坚定地致力于

早日建立这一法院,我们将继续在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我们坚定地相信,该法院将为人权和法治而迈出重要的一步。为此我们应确保该法院的规约得到迅速广泛的批准。

主席先生,我现在以萨摩亚作为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的身份并代表本联盟 43 个成员发言,请允许我最诚意地感谢你为确保本届特别会议获得成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

我还愿向所有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我们十分感谢它们在过去两天中参加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小岛屿国家联盟国家特别感谢承诺、谅解和支持的表示。

我们所听到的进一步激励我们真正和持久地《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存在着必须注意的严重挑战。我们决心将这些挑战变为机会。在你的支持下,我们相信很有希望取得成就。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希望代表大会感谢萨摩亚独立国总理刚才所作的讲话。

萨摩亚总理尊敬的图伊莱帕·塞莱莱·马列莱高伊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马来西亚总理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十分高兴地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马哈蒂尔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通过选举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向你和贵国致意。我深信,你的广泛经验和外交技巧将使你能主持大会会议使其成功结束。

我同其他发言者一起感谢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阁下,他以奉献和有效的方式指导了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谨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对本组织的竭诚奉献并为国际社会作出了许多贡献。

马来西亚还谨同其它会员国一起最热烈地欢迎基里巴斯和瑙鲁共和国及汤加王国成为联合国新会员国。我们期待与它们密切合作,尤其在我们地处的亚太区域共同关心的问题方面。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应审查本世纪的事件,以便我们可以学习经验并希望我们将知道如何处理二十一世纪事务。

本世纪目睹了摧毁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和杀害数百万人的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本世纪目睹了德国最不人道的专政,折磨并杀害 600 万犹太人。本世纪目睹了瞬间杀死几十万人而且其事后影响使更多人丧生的第一批原子弹。

在人类历史中最大战争结束时,这个组织联合国诞生了。我们以为会有和平,因为大国在联合国内进行合作。但情况并非如此。胜利者自己立即分成两个阵营,发起了冷战。然而,热战的威胁使战争冷却。各方发展巨大的核武器及非核武器库,因深刻误解而怒目相视,威胁性地以手按着其核扳机。

对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来说,存在积极的一面。担心向对方叛逃迫使两个阵营放松对殖民地领土的控制。各国获得了独立,但其生存取决于利用西方集团反对东方集团的技巧。

不幸的是,这种向另一方叛逃的选择不能持久。突然共产主义方面崩溃了。在西方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明显财富的诱惑下,东方集团一夜间放弃了其独裁的中央计划经济并采取自由民主的自由市场。它们认为既然它们现在具有与西方集团类似的制度,它们便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有益合作与帮助。

它们天真地认为在 70 年的指令经济和专政之后,它们可一夜间转变到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们很快发现,它们不知道如何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而且得不到西方国家的帮助。相反西方国家认为其无能的挣扎是永远摧毁东方集团,尤其是其主要旗手的机会。

就在无力管理自由市场已导致通货飞胀、国家企业的毁坏和大规模失业之时,避险基金和西方金融机构进入,使货币贬值并使这个一度强大的敌人成为债务违约者。尽管知道这些人根本无法管理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还是敦促并威胁他们继续干下去。东方集团国家没有回头路了。

东方集团的摧毁是彻底的。它再也不能在军事上向西方自由民主自由市场鼓吹者挑战。现在世界只有一种选择,世界各大小国家都不可能变节。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家认为在传播其制度或从中受益时不再需要温柔。除了唯一的主导集团所规定的以外,不许任何国家有任何其它政治或经济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丑态在资本主义最大倡导者的军事力量支持下自我暴露了。

对于小国来说,东方集团的灭亡是一个巨大灾难。现在它们面临其无法抗拒的压力,很快知道自由市场鼓吹者打算榨干它们的油水。至于其政治,自由民主制度的不稳定是其领导和人民不理解这个制度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它意味着它们将处于持续动乱,濒临无政府状态。

一些国家显然能够发展和繁荣,但为时不长。富国的货币操纵者及短期投资者很快通过使这些经济增长中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股价下跌使其陷于贫困。在贫穷和政治上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借钱。不管是故意的还是由于纯粹不理解,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制度进一步的破坏其经济状况。很快,其政治自由也遭到破坏,许多国家必须接受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治指令,否则就不向其提供贷款。从实际上讲,已经失去了独立。

因此对于世界上小的独立国家来说,前途很暗淡。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世界应当没有国界,各国之间的资本、货物和服务应当自由流通。不应当实行歧视性的关税来保护地方的工业或产品。地方的银行、工业与产品必须与进口产品平等地竞争,而其银行与工业必须与在它们国家设立的外国银行与工业竞争。对于希望在其国家内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与商业不应当提出任何条件。这些外国业务必须与地方企业一样具有本国地位。据说,这样,就会创造一个平坦的竞技场,竞争也公平了。

但是,尽管竞技场是平坦的,巨人与侏儒之间的竞争能公平吗?富国的大银行、公司和工业有一大片本国的市场,他们在一个小小的外国亏得起,因为他们同时能在国内和其他地方赚取大笔利润。小国的小型企业如果一再亏损,就会破产。最后,他们就要么把企业卖给外国大公司,要么就完全关闭。再也不会再有地方大公司,今后只会有外国大公司的分部,由其大搞调拨价格,并且将大部分利润汇回国去。

效率高的可能会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出口其本身的产品来赚取外汇,就无法支付进口产品。如果已没有钱支付,货物再价廉物美也没用。

穷国的市场也许不大,但是使它们变穷只会造成富国失去销售额。当外汇交易商使他们进攻的国家变得贫困时,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国家无法购买富国的产品;也就是说,富国失去了市场,世界贸易缩小了。产品与服务业跨过国境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是好事,但最后,它会毁坏市场,致使世界贸易收缩。自由贸易实际上会使世界变得更加贫穷。

上一次大战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对立致使多数殖民地获得自由,成为独立国家。独立意味着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由于不习惯这样大的权力,这些政府许多都失败了。他们向富国银行所借的债务已使它无法看到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无能和常常是压迫性的统治,但是二十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这就是独立的主旨。

在世界划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的时候,这一原则受到尊重。但此后,某国总统突然作出决定,它的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来保证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不受破坏,而不管这些国家的国界与独立地位。并没有人向这位斗志昂扬的总统授予这一权利。但是这类的小事情是不会阻止他们。

西方在海湾战争中宣布胜利被看作在道义上认可强国有权干涉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很快,这种干涉就不只是为了人权。政府的体制,司法制度的执行以及金融和商业制度都受到这些强国的仔细审查。他们坚称,只能有一种方法来管理国家,那就是自由民主的方法。他们坚持说,全世界只能有一种经济制度,那就是自由的市场制度。他们坚决主张,任何事物都必须是公开、透明的,私营部门与公营部门是分开的,各民族间不能有歧视,不能歧视外国人而偏袒本国人民。

所有这一些和其他的口号听起来都很好。这些显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奏效,使他们富裕并强大,使他们国家的人民享受很高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些是否对所有国家都有效呢?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用了几个世纪才使其制度产生效果。他们从封建压迫制度过渡到日前流了大量的血。由于一连串不顾人死活的暴君,其中有许多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强迫实行改革,大批富人和穷人数遭到了屠杀。

即使今天,他们的制度也没有为其大部分人民带来自由与平等,但是他们坚持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国家都必须采纳唯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他们的制度,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懂得独裁政体的新独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失败。特别是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无法应付自由民主社会中对政府提出的破坏稳定的挑战。

但是不允许新的国家有时间学习和掌握这一制度。他们不得不现在就立刻改变。如果他们的国家动荡,他们的人民遭受痛苦,他们的经济倒退,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民主化自由化。如果他们不这样作,那就通过要挟、贸易制裁以及必要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来迫使他们这样作。

这些措施比那些不受赞同的制度和体制更有压迫性是无所谓的。采纳经认可的制度会进一步动摇这些国家,造成进一步的困苦——所有这些都无所谓,因为最重要的是要采纳这一制度,而不是从这一制度里获得利益。

在经济管理上也是如此。必须开放自由,取消规章制度。政府不应当帮助商业部门,不应当对其加以任何保护。如果企业受到外界公平或不公平的袭击而失败了,那么就让他们失败。如果他们失败,那一定是缺乏效率,而这个世界对于缺乏效率的失败者是没有耐心或者同情的。

于是,外汇交易巨头以举债一百多倍的资金来与储备有限、没有举债权的中央银行来对抗。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遭受破坏,但是这些国家要求保护的呼声遭到了忽视。竞技场是平坦的,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秘密的自由贸易的一部分。人人都必须接受任何情况,因为这是自由贸易。外汇交易商所做的只是教训各国政府,使其遵守这一制度,放弃他们拙劣的旧制度。

在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得帮助企业恢复。否则就是为哥儿们救急。让他们垮;让他们血本无归。只有这样,才能认为这些政府是认真想要改革其制度,采纳最佳的做法,世界性的标准,以及管理其经济的唯一正当方式。如果政府在做这样的过程中破产了,那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做事情的办法对了,即使国家毁了,人民饿死了,无政府主义泛滥,政府被推翻了也无所谓。

西方对于人权的关注实在动人。但是人权的定义似乎局限于个人对政府的异议权而已。

西方对人权表现出动人的关切。但人权的定义似乎限于个人持不同与政府意见的权力。通过制裁甚至轰炸而使一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受苦,以便十几个异见者能够享受他们的提出异意的权力。看起来,人口的其余部分,有时是数以亿计的人则没有权力。他们的权力的不被看作人权。这样,由于货币交易而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工作不被认为是对人权的违反。在西方的概念中,只有个人有权力;广大群众没有权力。

对儿童劳工和血汗工场的关切表达了一种关怀。令人遗憾的是,只是在儿童劳工和血汗工场的产品成功地与发达国家中的享受高工资的、生活优越的、每周工作4天的工人竞争时,才有人表现出这种关切。

儿童劳工和血汗工场不是一种任何人会为其辩护的现象,但想一想一些国家的人民的极端贫困状态。他们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或专门知识、没有国内市场、没有受过哈佛大学教育的管理人员。他们只有廉价劳力。对这些工人来说,他们所赚的低微的工资远胜于饥饿和死亡。如果我们真的关心,那就投资和付高工资。血汗工场将会消失,成人份将会有足够的收入来喂养自己的孩子。迫使他们停止儿童劳工和血汗工场将只会为他们的人民造成更多的苦难。告诉他们不要生孩子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知道,穷人的生育率比富人高。为了停止西方所担忧的人口爆炸,就要使这些致富。关闭他们的血汗工场和使他们的孩子停止工作只会使他们更加穷困并使他们生更多的孩子。

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冲突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巴勒斯坦问题仍未解决,但对伊拉克的制裁和轰炸、对利比亚的制裁、由于苏联的分裂而导致的冲突,通过公开支持反叛而引起的动乱和叛乱的情况继续存在。过去,在各地、包括马来西亚煽动叛乱的是共产党人。现在,我们国家中有自由民主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并且也是有武器的供应。无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还是一个自由民主分子的叛乱,人民都同样受苦。

联合国似乎是无能为力的。确实,大国和强国往往不通过它采取行动。现在,强大国家组成的集团,甚至一个国家似乎可以决定何时介入,何时撤出。虽然它们喜欢运用权力,但它们非常不愿意付出代价。“电讯战争”是通过使用高级技术,例如所谓的精确落点轰炸来进行,以避免尸袋回家。这种不愿意面对敌人作战的心理往往导致不必要地杀死无辜平民和摧毁错误的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只要联合国属于5个常任理事国,谁也不应期待有任何改变。联合国的结构将继续反映这些国家在50年前的辉煌胜利。对小国来说,它们将被允许作每年的发言和各种周年纪念日发言。它们偶而也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但是,尽管5个常任理事国中至少有三个大声主张民主,但在联合国却没有民主。唯一积极作用的是联合国的机构和它们所做的有益的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中有些人根据颇不寻常的原则行事。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个中立的或不偏不倚的人来对某件事进行研究、作报告、提出意见或作出判断。但联合国选择了一个众所周知对马来西亚的司法体系进行恶毒攻击的人来提出关于这个体制的报告。联合国随后又授予他不受其本国法律约束的完全豁免权,而不征求这个国家的意见或批准。这种豁免似乎超越了他向联合国报告其研究结果的任务。他可以发表他的意见并对任何地方的人和他的研究对象进行诋毁。联合国的专员或报告员的豁免难道是有限的吗?

我们被告知,各国政府不能干涉司法机构。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政府被要求指示其司法机构不对违反本国法律的这名联合国专员采取行动。我不是在责备秘书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指导联合国选择它的专员或特别报告员的奇特制度和原则。我也不认为我应该暗示,如果此人没有得到豁免以使其免受由于公开蔑视和污蔑而引起的法院行动的话,马来西亚国家就会承受可怕的后果。这方面的做法有某种不适当的地方,联合国需要找出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小国缺乏自由表达它们观点的公共论坛。西方新闻媒介歪曲它们所说或所做的一切事。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也被期待着给西方新闻记者豁免权;他们可以违犯我们的法律,但不可以对他们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想指出,在马来西亚,即便是国王和世袭的苏丹也不能超越法律之上。

这就是二十世纪最后25年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带着这个包袱进入二十一世纪和新的千年。对贫国和弱国来说,对亚洲的希望成为龙和虎的国家来说二十一世纪看起来不那么充满希望。一切都将是在西方捏造的。正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自西方,自由民主制、全球化、无边界的世界、规则的放宽、资本的不受阻碍的自由流动和它们驱向质量的流动、市场和货币交易人对政府的约束,以及其他很多观念都来自西方。来自西方的就是普遍的。其他价值观念和文化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如果它们继续存在,就会有文明之

间的冲突。为避免这种冲突,世界上只应有一种文明。一切都根据西方的最佳做法标准化。它们只可以随着西方变化而变化。这样,全球化的世界将是完全同一的。多样化等于顽固不化,因此必须加以消灭。

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创痛的经历。在几周时间里,为发展国家而做的42年的艰苦工作全被摧毁,特别是为减少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的怨恨而采取的肯定行动。

我们已制定了自己的复兴方案。在真主的保佑的下,我们已所好转,走上了复兴的道路。但我们正被迫放弃我们的货币管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这种控制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它除几千个富有的货币操纵者外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害处。在我国从事真正商业的外国人也从所谓的控制中获得利润。但是仍然敦促我们同意一种使肆无忌惮者能够摧毁很多国家财富的国际金融体系。

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努力来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迄今只是有关意图的谈论。但金融、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威胁依然存在。

马来西亚仅希望能够为了其人民的利益按自己的方式管理事务。我们不会伤害其他人。我们不会对世界不闻不问。我们始终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同联合国进行合作。我们将为世界和平竭尽全力。我们就在接受必要和不必要的批评时,希望其他人也将容忍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如果只能对穷者和弱者进行批评而永远不能对富者和强者进行批评,言论自由就将失去意义。我们在批评他人时,只是在行使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们所遇见的下一世纪的前景并未使我们很陶醉。但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们将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一切对我们友好者友善,不对任何人怀有歹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马来西亚总理刚才所作的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巴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阁下发言。

唐纳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同我的同事们一道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对这些会堂来说并不陌生,你在这里最初

是观察员,后来成为代表。你带着丰富的经验担任这一职务,我们高兴地看到纳米比亚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承担起领导的角色。

在我讲到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前,我要借此机会提到两件事。

我欢迎联合国的三个新成员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我们在亚洲-太平洋社会与这三个国家密切合作,所以我现在非常荣幸地作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有机会把这种合作带进这一更广泛的国际大家庭。

第二件事则与今年早些时候吸引了全体澳大利亚人的注意:即澳大利亚反对种族剥削运动的两名工作人员史蒂夫·普拉特和彼得·华莱士的命运,他们被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监禁。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史蒂夫和彼得于9月1日从狱中释放。秘书长柯菲·安南、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的努力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的持续努力,在使他们获得释放方面是很宝贵的。

我还要感谢芬兰的阿赫蒂萨里总统、希腊政府、纳尔逊·曼德拉、教皇约翰·保罗和很多对此事慷慨支持的其他个人。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表明了我们保护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不受迫害和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地完成其重要工作所共同作出的坚定承诺。澳大利亚将继续支持各种国际努力,以确保一名为澳大利亚反对种族剥削运动雇员的南斯拉夫国民布兰科·耶伦获得释放,他仍在南斯拉夫监狱中服刑。

主席先生,你在世界各国进入新的千年为一最有利的时刻承担你的责任。在他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我们应当思考联合国的过去与未来,它取得了什么以及还有那些任务仍未完成。当然,该议题的各个方面向联合国本身的行动一样多种多样,联合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变成了一个涉及几乎人类存在的每个方面的组织。

今天,我仅集中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或许是本组织面前的归根本任务:通过人道主义干预而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该议题一直处于我四围的中心,特别是由于在最近几周内澳大利亚在解决东帝汶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联合国在该领土上的活动是本组织确实能够为其增添价值的那种工作的例子。

另一个问题即联合国的改革,表面上是一个相当平淡无奇的问题。但事实上改革是本组织每一种职能的

关键,因为没有改革我们就无法希望使联合国能够面对我们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要求。联合国必须有所变化和调整,否则就变得日益无关紧要。

我现在谈一下东帝汶未来的问题。自东帝汶国际部队第一批人员开始到达帝力已展开根据安全理事会9月15日的第1264(1999)号决议为其规定的任务以来现已过去一周,它的任务是恢复东帝汶的和平与安全、保护和支持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完成其任务,并以部队的能力来推动各项人道主义援助计划。

我高兴地报告:东帝汶国际部队的部署顺利而且和平,部队的人员现已遍布东帝汶的领土。该部队已开始了让这一动荡的岛屿恢复和平以及帮助为提供东帝汶人急需的食品、住所和医疗帮助创造应有环境的重要工作。这是联合国同东帝汶之间长期联系的最新一章,这种联系已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把我们带到这里的进程是漫长和困难的,但最终我们能够接近这一很久以来缠绕东帝汶人民的悲剧的和平解决。

我们能够达到这一步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印度尼西亚的哈比比总统。是哈比比总统在前总统苏哈托离开后领导他的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在哈比比总统的指导下,印度尼西亚举行了40多年来的首次民主选举,而且正等待选举其下一届总统。也是哈比比总统决定让东帝汶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更大自治与独立之间作出选择。这些是重大的决定,反映出印度尼西亚社会在仅仅短暂的几个月内所迈出的巨大步伐。澳大利亚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始其向民主的过渡之际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这样做。

尽管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东帝汶的过度进程,但哈比比总统及其政府仍应为实际开创这一进程而受到充分赞扬。我还要特别提及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设法和平解决东帝汶地位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和联合国今年5月5日缔结三方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秘书长的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他帮助指导各方达成协议,就东帝汶的前途进行了可靠和秩序井然的投票。他这样做保持了其各前任秘书长的光荣传统,自1983年以来的历任秘书长都一直在为全面和公正解决该区域的困难同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合作。

如果我不同时提及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姆希德·马克大使及其副手弗朗切斯克·本德雷利在缔结协定前后所作的出色工作,那将是我的一项疏忽。这两个人的

工作对谈判取得圆满成果和在东帝汶举行投票至关重要。

当然,缔结三方协定只是让东帝汶人决定自己命运进程的开始。随着安全理事会 6 月 11 日建立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东帝汶特派团),举行全民协商的实际工作已在进行之中。东帝汶特派团在伊恩·马丁的领导下,已着手为仅短短 12 个星期后的投票从事困难且经常十分危险的组织工作。由于伊恩·马丁及其工作班子的热情和勤奋,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取得了很少有人会想到结果。45 万多人能够登记投票,其中 98.6%实际投了票,这个事实就是对东帝汶人民的勇气和民主渴望的突出赞颂。

然而,这也是对东帝汶特派团及其工作人员效力的赞颂,是表明联合国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冲突和过渡局势的良好范例。东帝汶特派团工作人员在选举前那几天并在选举后的悲惨日子里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我们最高度的赞扬。他们在紧张和情绪激动的气氛中,手无寸铁地出色履行了其职责。特别是分别由孟加拉的雷扎库尔·海德爾准将和澳大利亚的阿伦·米尔斯专员领导的军事联络部门和民警部门,作为东帝汶特派团同印度尼西亚警察和军事当局的联络中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帝汶特派团在有关工作人员冒很大危险情况下从事了其工作,不幸的是,几个当地招聘的雇员为其献身精神付出了生命。这个事实明显提醒人们,联合国行动经常要付出巨大的人员代价,并提醒我们大家,必须把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人身安全作为我们最紧迫的优先之一。联合国必须依赖其工作人员从事各项任务。必须把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人身威胁视为对联合国本身的威胁。

东帝汶在 8 月 30 日投票后暴力现象急剧增加,不仅波及联合国工作人员,而且也波及数以百计,可能数以千计的东帝汶人,这是一个不幸的记录。世界目睹了那些不愿接受投票结果的人对该岛人口施加的最可怕暴行。哈比比总统通过安全理事会谋求军事援助,应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安全理事会作出了回应,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决议,并规定了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任务,该任务将确保东帝汶人民 8 月 30 日投票表达的意愿得以实施。

我们澳大利亚对各国积极响应派军队组成东帝汶国际部队及其后继维持和平部队的要求感到非常欣

慰。正如我提及的那样,由彼得·科斯格罗夫少将领导的国际部队已开始在东帝汶恢复秩序。目前在实地有大约 3 200 名从各国抽调的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来自我们自己的亚太区域。大量国家参加该部队及其广泛的地域代表性证明,国际社会普遍决心确保东帝汶地位和和平有序地过渡。

我还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东帝汶特派团人员目前已返回该岛,并将能够继续从事其重要的工作。

我还必须在谈到联合国在东帝汶的活动时,提及联合国各机构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绪方贞子女士已前往西帝汶,视察该领土内东帝汶难民的苦难,澳大利亚完全支持她的努力。

澳大利亚还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等机构从事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中转站。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计划作出更多的救济努力。澳大利亚已经为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人道主义努力认捐 700 万美元。

联合国也在设法处理东帝汶普遍存在的侵害人权现象。安全理事会第 1264(1999)号决议要求依法惩处东帝汶境内暴力行径的负责者。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努力追究对东帝汶人民犯下滔天暴力罪行负责者的责任,并将在这方面提供一切适当协助。

更笼统说,现在迫切需要尽快进入联合国东帝汶计划的第三阶段。这需要各方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同秘书处密切合作,澳大利亚将尽力协助这一进程,为该土地地位的过渡奠定基础。

联合国已在其东帝汶活动中展示其作为一个组织的部分重要实力。联合国正在帮助解决一个 25 年来不断恶化的国际问题,联合国提供了基础设施,使东帝汶人民得以自由和公正地表达意愿。当安全状况无法得到控制时,联合国协助创建了国际部队,以便使过渡进程回到轨道上来,并制止严重侵害人权行径。

这一进程的深刻历史反响令我感到震惊,因为当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成立时,它作为一个组织的部分理念就是摆脱以诉诸侵略进行惩罚的陈旧循环,公正和客观地解决国际问题。古老的诉诸武力办法和强权有理的概念一定会被推翻,取而代之的就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全球问题进行合作。世界在战胜纳粹主义后,决心再也不让类似的邪恶出现。

然而,我们在过去 50 年中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实践并没有跟上理想的步伐。然而,这一进程时常起到其作用,我认为,联合国在东帝汶的许多工作内容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不是说该进程不能得到改进;当然它可以改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并加强我们东帝汶经验的积极因素,则我认为,我们就不仅可以改善该领土人民的状况,而且还可能在今后能够更迅速和更全面地解决其他国际危机。

我们还必须从东帝汶事件的消极方面吸取教训。我们通过在那里的努力,展示了联合国可以圆满完成工作。让我们加强这种效力,努力使联合国在下个千年成为一个同全球和平与安全更加相关的组织。

我现在谈一谈提高效力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改革问题。秘书长在最近一份有关千年大会和千年首脑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中,把联合国描述为一个独特的机构。没有人会不同意,联合国在过去 50 年中为谋求和平与安全、为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进步和为促进人权所作的贡献,不仅具有重大价值,而且确实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

然而,二十一世纪将带来新的挑战,我希望,新的机会。

在科菲·安南的领导下,本组织已开始采取重要而必要的步骤,通过真正的行政和管理改革,使自己有能力面对这些挑战。改革中包括财务和人事工作有希望的变革,重要的节约,改进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协调,秘书处结构的重大合理化,以及更加有效地利用技术。这种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加有效,给本组织带来了真正的节约。这些节约可被用于其他方案,造福于所有会员国,特别是联合国的发展中成员国。

对联合国,而且让我们大家都承认,对联合国会员国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势头的维持和前进。40 多年前,一位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说过,“当我们谈论联合国时,我们应该记住联合国事实上是什么,而不要空想在另外一种世界我们希望联合国是什么。”

我们需要同意,联合国存在于一个现实世界中,对联合国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抱现实的态度。我们需要确保,本组织的结构和进程更好地反映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我们需要一个扩大、更富有代表性和更加透明的安全理事会,一个反映当今而不是 60 年代初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现实的选举集团制度。要在这些和其他问题上实现

真正的改革,会员国必须以持续与合作的方式一起努力。而且它们还必须表现出对本组织的承诺,按时付清会费。

联合国改革意味着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能够兑现它对世界人民的承诺的联合国组织。它意味着减少浪费,增加实际工作。它意味着发展一个能够应付下一世纪可能带来的任何挑战的组织。最终,它意味着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纷纷落马,被迅速变革的节奏所淘汰时,创造一个能够维持其作用的联合国。

我想以呼吁联合国集中建设它的强处来结束我的发言。我已提到需要坚持一项彻底和根本改革的方案,因为那是本组织继续有效的基本前提。但我也提到联合国在东帝汶的工作,作为本组织如何能够确实解决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外交政策和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真正作用的一个例子。联合国不仅能够在许多观察家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组织完成了一次投票,而且还能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派进一支维持和平部队。那些企图消灭整个社区的人被挫败了。

这些都是伟大的强处。但是我们需要能巩固它们,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组织。比如,我们必须能够确保,在情况急剧恶化,威胁整个国家的时候,联合国能够快速干预。这就是卢旺达的教训。上星期秘书长在大会上讲话时谈到这一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秘书长所说,国际情况的变化——包括个人权利的概念和国际社会有责任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有效反应的思想的扩大——正在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提出挑战。联合国需要侧重这些挑战,并开始决定面对人道主义危机,本组织应何时和如何行动的进程。

说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可能已是一句陈词滥调,但这仍然是事实。面对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世界各国如果行动太缓慢,在过去可能得到原谅。各种暴行、饥荒和自然灾害的消息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才能传出地球上比较闭塞的地区。今天,这些消息可能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展现在电视屏幕上。

面对这种无可争议的事实,各国政府将被迫行动。那些抵制行动的,政府将面对同它们一样了解情况的国内和国际大众。这就是联合国将越来越多地运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无行动的结果立即可见,失误的后果将立即受到毫不留情的检查。

有的国家可能担心干预国家主权,这一关切显然是重要和正当的。也有人会说,自然的人类团结的原则更

重要。不管哪种意见正确,这种环境是我们必须应付的事实,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当我们每年聚集这里纽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忙于联合国的日常事务,忙于决议、委员会会议、通报和开会讨论。

我们是否经常停下来,问自己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真心诚意地想捍卫《宪章》,如果我们真正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帮助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长处,促进尊重人权和基本改革,我们完全可以从维护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利开始。

面对种族灭绝的行径,或者大规模的践踏人权,世界各国必须采取行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但我也非常相信理想主义的价值。5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创立了联合国,坚定地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取代旧的,一种国际合作行动的精神能够避免已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竞争和侵略。

确实,在本世纪将要结束时,联合国没有实现联合国缔造者的所有希望。但是,本组织的巨大希望仍在。联合国对东帝汶事态发展的反应已经表明,本组织的积极行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我们知道本机构能够实现的伟大成就。让我们大家努力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最迫切问题的组织。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积极和切实的联合国,来满足联合国会员国的愿望和全人类的正当需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我请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先生阁下发言。

利维先生(以色列)(以希伯来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召开正值人类将要进入下一个千年。它成为重新塑造国际大家庭版图的一长串激烈事件中的一环。

联合国是在人类历史上最痛苦、最致命和最不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毁灭的背景下成立的。纳粹政权的极度邪恶就好像人类文明史陷入了一个深渊,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把它视作一场恶梦:人创造了一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在世界上大肆制造破坏、毁灭、恐怖和消亡。盟军对纳粹恶魔所采取的态度以及1945年4月联合国在破坏势力即将被击败前夕的成立,标志着人类恢复了理智,要拯救人类的未来。

在本月我们纪念最可怕的战争爆发60年的时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抱有希望,更强烈地

相信联合国及其在世界各地所开展活动的必要性。联合国各机构都在努力改善世界人民的健康及照顾病人;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和营养;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桥梁;促进教育和克服无知;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带来希望;以及为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联合国部队的士兵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维持和平人员。这些部队中有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士兵。有时,他们在世界各地充满冲突和暴力的地区冒着生命的危险,无论联合国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建设和平还是充当保障和平的观察员。这些对于国际关系的决策者和确定者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对于联合国士兵个人而言,并无任何意义。他们驻守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将希望和安宁带给充满悲剧、痛苦和暴力的地方。

经过许多世纪的暴力和战争以及以残杀为宗旨的意识形态为名而实施的奴役和破坏之后,经过东西方数十年的冷战和世界两极分化之后,人类现在正在和平与和解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我们眼前,一个进程正在全世界展开,预示着未来的希望。人类正在走一条新路,一条以赛亚先知早在2600年就预见的道路,这就是,有一天,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山事。”(《圣经》,《以赛亚书》2:4)

联合国已经将这一预见当作一个希望的源泉,当作人性中善良战胜邪恶的象征。这一预见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世界各地珍视和平的所有人以及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他们的代表的指路明灯和应走的路。

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卫星、因特网和电讯网络缩短了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过去的政治和思想意识体系已经瓦解,敌对意识的围墙也已经同筑起这些围墙的暴君和独裁者一起倒下去了。它们正被新的体系所取代。其中一些体系正在普遍存在发展和繁荣的地方建立。我希望而且相信,这些有益的转变也将在中东出现。

在我们区域,希望之光也已重新点燃。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政治进程,其目标是在各国之间实现和平以及在各国人民之间达成和解。以色列渴望实现与其邻国的全面和平,一个和睦的和平。以色列将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政治和战略上的和平。我们认为,没有战争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和平。

我要再次强调,和平意味着和平文化;和平意味着不再存在暴力的威胁,无论是暗含的还是赤裸裸的威胁;和平意味着结束抵制,结束蔑视和抵毁,结束煽动和对抗。和平也是一种和平语言:它是领导人对各国发表讲话,教师教育学生以及宗教领袖启发追随者的方式。

在各种形式宗教极端主义腐蚀他们的头脑,侵蚀人的智慧和自由的时候,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必须得到加强,各种宗教也必须以它们提倡容忍与共存的开明形式加以体现。

在实现我们区域和平的道路上,我们往往发现自己面临着各种矛盾的现实。在从事政治进程的同时,我们的谈判伙伴却在各个国际论坛上,包括在大会讲台上不断对以色列发动政治战。这种两面的做法与阿拉伯联盟对待以色列的极端决定一样,是与和平进程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不可容忍的。阿拉伯联盟的决定不符合《沙尔姆谢赫备忘录》中所表达的和平精神。

我们希望并期待出现一种不同的气氛,一种能辅助以色列新政府所发起势头的气氛。我们悲哀地目睹发生了破坏和平实质的事件。这些事件完全反映在危害和平的决议中。

一方面开展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则继续提出反以色列的声明和决议,这使人们严重关切我们的谈判伙伴和它们的和平观念。这是开放世界的正常化和平,还是仅仅暂时的初步承认?我们与诸人摩洛哥、突尼斯、毛里求斯、卡塔尔和安曼等海湾和马格里布国家的关系是会扩大和发展,还是说每当谈判中出现困难或者每当出现争议的时候,这些关系便会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鉴于以色列在这一过程中所承受的沉重代价和严重危险,因而不能容许继续对这些根本问题持怀疑态度。

三个星期前,即9月4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了《沙尔姆谢赫备忘录》。该备忘录第一次在临时协定与最后地位协议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按时间顺序的政治和概念方面联系。9月13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恢复了最后地位的谈判。

我们决心缔结一项框架协定,它将按照在《沙尔姆谢赫备忘录》中所陈述和商定的那样,成为在2000年之前缔结最后地位协议的基础。在这一构架内,我们将挑选出最后地位协议的有关问题并确定其议程。目前的各种问题以及各方的不同看法和立场都是众所周知的。只有通过直接的谈判才能解决各种分歧。

关于最后地位,我要在这个讲台上声明,在我们将政治分离作为永久解决办法的主要概念之一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说,为了双方的利益,我们不一定要割断对于各个生活领域的共存极其重要的联系。

以色列认为,不同的谈判轨道之间不存在着竞争,而且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竞争。以色列还急切地希望与我们北方的邻国叙利亚达成和平。这毕竟符合以色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更高的共同利益。但以下的要点也必须与这些共同利益一起阐明:象以色列这样的民主国家不能接受开始对话的先决条件,即必须事先接受对方的极端和顽固方案所规定的最后结果。

我们必须保持善意的势头,以便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地面对我们的儿童,不仅是以色列的儿童,而且还包括叙利亚的儿童,我们能够坦诚地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尝试并尽了我们的力量。我呼吁叙利亚的领导人,考虑到我们曾经一起经历的一切,勿再犹豫。现在是开展对话的时候了。会议和讨论并不是政治贡品,它们是基本的必需品。

我们希望黎巴嫩在实现全面和平的道路上加入和平缔造者的阵营。在其领土上所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必须结束。对黎巴嫩,我们从未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和争端。我们的一项利益,而且是唯一一项利益便是确保我国公民的安全。我必须说,令人遗憾的是,黎巴嫩政府多年来一直没有实施对黎巴嫩南部的主权并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我希望这一局势会迅速改善,而且以色列将可以在一项协定框架内撤离黎巴嫩南部。

尽管这样,怀着这样一项抱负,我愿强调指出,在这条轨道上我们不会长久成为这一顽固和蔑视态度的人质。我们作出我们视为合适的自主的决定,以确保我们获得保护和我们的切身利益,同时考虑各种选择。

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和解必须给人这样的希望,即该地区的所有人民将从和平中获益。不应将正常化视为单方面的姿态。正常化作为和平共存的自然结果,并不仅仅是为某一方服务的。它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我们希望早在今年就恢复多边会谈。必须在地区多边项目中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我们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潜力。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潜力,我们必须在该区域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合作的机制。这一合作显然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

我们地区缺水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会在今后几年里迫使中东地区的居民采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色列预计到了这一问题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一样,区域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并将是所有方面受益。

各多轨工作组承担着各种最重要的任务。不幸的是,他们的活动已因不相关的原因而受到冻结。现在是纠正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任何延误或强加条件都有可能破坏和平进程并耽搁对该地区人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实施这一重要进程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轨道上,我们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帮助。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以及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加拿大、挪威、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帮助,他们一直在提供援助并将继续提供援助。他们的重大贡献赢得了这一论坛的特殊赞扬。

埃及和约旦在拆除敌对之墙和使我们地区关系解冻中是我们的第一批合作伙伴。改善我们与埃及的关系以及恢复多边谈判,对进一步实现我们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邻国之间的适当和有利关系的典范。我们打算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加强并扩大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沿着缔造和平的困难道路继续前进时,我们悲伤地回想起那些曾经开辟道路但已不在人世的那些先驱,他们是已故的梅纳希姆·贝京、安瓦尔·萨达特、伊扎克·拉宾、侯赛因国王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他们的工作鼓舞着我们继续努力工作以完成他们的建立和平事业。

我们不能幻灭。我们的区域既不是北美也不是荷比卢三国。即使当我们就和平进程进行谈判时,我们仍意识到直接面对我们的威胁和危险,它们直接威胁着我们整个地区的稳定。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潜在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加起来对我们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将来产生着威胁。这一威胁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学术讨论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我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呼吁,停止向那些威胁着以色列国和整个区域生存并试图获得非常规武器的国家提供所有的技术、科学和其他各种援助。

波斯湾战争表明,缺乏理性和稳定性的领导人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和整个世界构成了威胁。在伊拉克的监测小组和机制必须立即恢复。只要伊拉克试图获得

非常规性武器并对该地区构成威胁,这便是国际社会的义务。联合国是最大、最有权威和获得最多国家承认的国际机构。因此,它必须在遏制这一危险的过程中采取主动行动和负起责任。

恐怖主义是另一个战略敌人,我们不能对其存在采取将就态度。那不仅是对以色列的威胁,也是对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威胁。恐怖不受边界或文明制度的制约。因此,无论是以色列与其邻国所进行的谈判,还是更广泛的区域方面,我们都不能容忍恐怖主义。任何以为恐怖令人厌烦但可以容忍的人犯了错误。恐怖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威胁。必须对其采取综合、协调和坚决的措施。

在用石头和玻璃建成、我们当今世界以光明和黑暗反映形象的这座大楼中,对手和敌人象友邦和盟国一样聚集一堂,创立了一个讨论和共处的论坛。讨论是解决冲突的方式。它也是明天的方式。对话和共同语言是外交手段,是创立一个新的现实和一个稳定和更安全社会的基础的原材料。

正是在这里,在大会上,在本十年初期,我第一次遇到了我的中国同事。两国之间经过长达40年之久的完全分离后,我们努力在以色列和中国之间重建了外交关系。同样是在这里,我们为与前苏联以及印度、尼日利亚和其它国家建立关系奠定了基础。这只是一些例子,显示了在这一场所沟通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我国经历巨大的困难,只因加强发展努力才克服了这些困难,以色列国因此参与了国际努力,援助他人,并与他人分享我们在各个领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以色列为其与整个世界分享和认同的古老传统而自豪。

以色列通过其外交部中的国际合作司,不断实施项目,并在以色列开设一系列培训课程。我们有示范单位,并且正在开展研究工作,例如,最近在毛里塔尼亚建立了一个特殊医疗中心,为该国许多患有慢性眼疾的公民提供服务。同样,以色列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培训专业人员掌握必要的技术和能力,以应付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的各种挑战。

国际合作司成立40多年来,为120多个国家培训了70 000名人员,他们来到以色列,参加其在农业、水资源、保健和医疗、科学、教育和其它领域开办的培训课程。

仅在1998年,就举办了大约155个涉及各种专题的培训课程,有4000多人参加培训。我可以高兴地报告,许多受训者来自中东国家。过去一年来,有多达820名巴勒斯坦人参加了这些课程,因而巩固了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桥梁。在同一年,以色列在60多个不同国家举办了150多个课程,有超过7000人参加培训。我自豪地指出,在我们派出以色列专家的许多国家,当地人员已将我们的善意化为现实的积极成果,造福于其人民和国家。

国际合作司因其享有的声誉,也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部门,世界各地人民在面临自然灾害时,可以从这里寻求帮助。最近我们目睹了在自然灾害期间此类援助是何等重要。以色列对人民的援助和救济请求一向作出积极的反应,不论政治背景或外交关系现状如何。

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朋友和盟邦美利坚合众国表示支持和赞扬,它努力促进国家之间合作的价值观,激励着我们所有人。美国还加紧努力,促成中东的真正和平,我们也要在此时表示我们的感谢。

甚至今天就在美国,我们再次看到有人重新诉诸抵制威胁。现成的例子就是有人威胁要宣布对美国迪斯尼公司进行抵制,因为该公司敢于允许在庆祝千禧年的一次展览中描绘耶路撒冷。我们谴责这些威胁和某些阿拉伯国家使用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手段。它在这里或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

自从耶路撒冷的建造者、《圣经》所说的大卫王时代直到今天,几千年过去了,除以色列、即犹太民族外,耶路撒冷从未用作世界任何其它国家的首都。即使在我们被迫逃离以色列土地以后,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始终忠实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之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是我们信仰和希望的来源。在我们流亡的日子里,在东方,在西方,在非洲沙漠,在西伯利亚荒原,从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到黑暗的宗教审判时代,从浪漫时代繁荣的欧洲到尸骨成山的大屠杀时期,在所有这些日子里,犹太人的眼睛都朝向耶路撒冷,并为它而祈祷。年复一年,从父亲到儿子,犹太民族的颂歌始终是“明年在耶路撒冷”。

前人逝去了,流亡结束了,我们有权被视为应当返回耶路撒冷,在废墟上将这座城市重建为一个美丽的中心,对所有宗教的信仰者开放,正如诗人所说,在这里,所有宗教的自由是生活中的现实。

令人不安的是,甚至就在今天,以色列国独立51年之后,仍然有人企图否认我们为首都选址的自然权力,这是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的自然权力。从大卫王的城

市耶路撒冷,我要引用大卫关于耶路撒冷的最初的诗篇,诗篇中的文字超越了时限,激励着每一代人: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圣经·诗篇》122:2-3)

今天如同以往一样,在这一讲台上,我们向全世界、向我们的朋友和人民并向那些远离我们的人宣布:在以色列主权下统一的耶路撒冷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以色列的首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林外交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哈利法阁下发言。

哈利法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你的经验和才能将极大地影响本届会议的进程取得圆满结果。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在你履行职责期间给予合作。

我要借此机会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迪迪埃·奥佩蒂·巴丹阁下表示感谢,他为该届会议取得的成果和成功作出了贡献。我还很高兴对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赞赏,他努力推动本组织履行其职责,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合作。我还要表明巴林国衷心祝贺贺加王国、瑙鲁共和国和基里巴斯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99年3月6日,巴林国向巴林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了伊萨·本·苏莱曼·哈利发陛下逝世的悲痛消息,愿真主赐与他安宁和宽容。他是一位伟大和仁慈的埃米尔,热爱人民,并以其出众的人格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体现了巴林人的特点:忠诚、宽容和谦恭。愿真主赐福与他,他倡导国家独立、《宪法》、协商进程以及实施国家体制和法制。他倡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全面复兴和多样化。他在极为艰难的时刻和局势下,始终倡导海湾合作和阿拉伯的团结。

他倡导和平、国际合作和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友谊。他倡导和平、国际合作和所有国家人民的真正友谊。

这些事业是已故埃米尔的遗产,他的做法将继续是指导巴林沿着民族道路前进和谋求海湾合作、阿拉伯团结、与邻国的区域合作和与所有国家国际合作的灯塔。

本届会议的召开正值一个世纪的结束和新的千年的开始之际,鉴于这种特别重要性,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反思联合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经历。应该再次强调,在我们临近第3个千年时,我们应该使我们行动的方向与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保持一致。这些原则和宗旨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并在平等、正义和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促进和平和经济社会发展。

联合国50多年的经历和在处理危机和解决世界面临的挑战方面的成功与挫折表明,我们在筹划未来时,应该考虑到过去经历的教益。这样,我们就更能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和更光明的未来,更竭诚对待联合国。这种经历已证明,背离联合国的原则、《宪章》和决议曾经使许多国家间的关系紧张,造成区域冲突和种族冲突,使世界许许多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的这些努力值得我们钦佩和承诺,这样,我们就能够减轻那些因为贫穷和没有安全、稳定和体面生活的基本需求的人们的痛苦。

因此,我们都一致认为应该在未来的千年里增进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以体现国际社会的良知和表达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宪章》中描述的我们共同人类志向得以实现的更美好世界的希望。

巴林过去两年在安全理事会的经验表明,小国能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作出有效的贡献。这一经验还加强了巴林的信念,最显著的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合法性,因为它们反映了国际社会希望在安全、容忍与和平中生活的意志和愿望。这一经验还确认了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观和原则的公平地域分配和透明度原则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将提高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有助于促进安理会有效运作的的能力。因此,必须努力改革安理会,使之充分反映政治现实和应付下个世纪中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作用要求把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互相联系起来以便防止冲突再起;因此,去年12月巴林任安理会主席期间要求举行公开会议审议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关系。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广泛参与这次会议说明许多会员国相信,这种联系对于使政治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行动结合在一起至关重要。

巴林参与寻求办法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共同努力的积极性和兴趣体现在无论安全理事会何时处理这

些问题,巴林总是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通过已经积累的专门知识,巴林无论在本地区还是在国际层次都将积极参与推动安全、和平与稳定的原则。

自巴林的现代复苏开始以来,我国一直在发展个人并使之有准备和能够胜任应付我们时代的要求和积极参与当前和未来转变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发达的文明社会。因此,巴林建立了开放和发达的经济,使我国能够实现全面和可持续的人的发展。这反映在巴林连续5年在人的发展指数中名列前茅。这还反映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中。我们赞赏开发计划署对许多国家发展的领域的贡献和努力。

巴林国很久以来就了解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并因此制订了发展和利用巴林在所有领域里的能力的计划和政策。巴林还进行立法,鼓励妇女工作和进入劳动市场。因此,1998年巴林妇女在整个公共部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达到33.5%,私营部门劳动力妇女总数达到20%。巴林国为其在区域和国际层次的这一成就感到自豪。它在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及其它领域为男女提供了平等机会,因为这些领域是人权的基本优先领域。巴林在这方面的努力受到联合国人权机构和专家的赞许。

巴林在其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殿下领导下的新时代里,将继续自己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巴林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处于突出的地位,从而成为既顾及全球方面又维护自身遗产与传统的逐步发展的榜样。

在过去20年里,海湾地区发生了严重而令人心痛的事件,其影响仍然对这一重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而这一地区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各国的互利的相互交流的枢纽。

这些事件已表明,维持和保护区域安全只能建立在尊重和严格遵守巴林国一贯拥护的原则基础上,尤其是尊重既定边界的现状和不可侵犯性。该区域各国间的关系应建立在睦邻、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承认每一国家的国家主权是保持该区域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就象以有关国家可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一样。

因此,巴林重申它对一些区域和国际问题的一贯立场以及它对维护世界尤其是海湾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极大兴趣,巴林再次呼吁伊拉克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尤其是那些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释放科威特及其它国籍战俘和被拘留者有关的决议。

与此同时,巴林再次敦促继续努力以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因制裁而遭受的苦难。它也渴望确保伊拉克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反对任何对其内政的干涉。

为了海湾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巴林希望再次强调,它支持为和平解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对三个岛屿,即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岛的争端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三个岛屿都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一方面,巴林祝愿海湾合作委员会设立的三方部长委员会解决争端的工作取得成功。解决争端的方式将导致在睦邻、相互尊重和遵守相互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友好和正常的关系。

关于安全与稳定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强调领土要求的危险,这些要求旨在改变既定的、继承和传统接受的边界。因此,巴林欢迎1999年7月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确定了成员国遵守非统组织宪章和非统组织在继承和传统接受的边界方面的各项决议所规定的原则。

过去三年里,由于以色列前政府采取的僵硬立场和矛盾的政策,中东和平进程遇到了挫折,这冻结并几乎摧毁了这一进程。现在既然一个新政府已执政并许诺准备恢复和平进程,从最初就赞同这一进程并一贯努力争取其成功的巴林,表示希望以色列新政府将许诺转变为全面、彻底和忠实地执行达成的所有协议,并对推动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国际努力作出反应。

因此,巴林国欢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近就执行在沙姆沙伊赫签署的怀伊河协定达成协议,认为这是朝向双方间达成最终解决和加强所有其他各方间和平进程的一个积极步骤。

阿拉伯方面已一再重申它对1999年马德里会议原则中体现的和平条件以及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的承诺。它认为,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将是一个战略选择,它将使以色列有义务承认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遵守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各项相关决议,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第242(1997)和第338(1973)号决议,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全面撤出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撤至1967年6月4日存在的边界,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撤出黎巴嫩领土。

和平进程的成功和公平、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实现无疑将对该区域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未来稳定与发展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强调必须努力,以使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其中包括核武器。

今年,在一个引起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深切担忧的问题,即洛克比问题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在此想赞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该案例的其他各方所表示出的合作精神。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中止对利比亚的制裁,并表示感谢兄弟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南非政府、秘书长以及有关的区域组织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导致就这一案例达成一致。我们希望这将导致彻底解除制裁。

科索沃危机由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自己的家园和村庄而得以缓和,这使国际社会充满希望并感到满意。然而,整个世界都看到种族清洗、无辜者遭受恐吓和科索沃人民遭受苦难的可怕镜头,其中包括约一百万科索沃人流离失所,千人冢和摧毁村庄及家园。国际社会有责任坚决反对并解决种族主义现象的根源及其一切表现形式。

鉴于巴林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极感兴趣,它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迅速加紧努力,与有关区域组织合作,解决在各区域以及一些国家之间发生的持续的冲突。这此冲突包括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紧张局势,以及阿富汗、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帝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内冲突。

恐怖主义、暴力、有组织犯罪和相关的活动,例如跨国毒品和武器贩运等现象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其他根源。这些现象继续对所有社会造成威胁。为解决这些问题,巴林国支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呼吁,它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制定一项综合战略,打击和消灭这种现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贸易方面,世界经济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出现巨型联合贸易大企业,以及在技术、信息和通信领域出现的革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建立约半世纪后,国际社会能够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以便承担为今后几十年世界贸易制定框架的责任。现在,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国际社会必须制定

雄心勃勃的目标,其中最明显的是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

虽然最近 8 国集团在解决债务问题方面的积极和建设性立场创造了信任和令人满意的气氛,但必须强调两个重点。第一,偿还剩余款项的负担以及还本付息不应干扰有关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第二,必须创造有利环境,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而且在透明资本市场框架内促进国家间经济和贸易合作,并且辅助技术和鼓励国际投资,这会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协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公平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将使世界经济避免可能具有普遍影响的其它冲击。巴林国乐意促进旨在实现更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国际努力,因为它享有稳定和战略位置以及贸易与投资环境——这些因素已经帮助巴林吸引外资并加强其发达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

随着新世纪即将到来,世界目睹了技术和科技进步、电信革命、快速信息流动、全球开放市场趋势、国家、文化和文明间相互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所带来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一切预示全人类更美好世界的到来。然而,在我们赞赏这种进步的积极方面时,我们有义务提醒人们提防伴随这种积极方面的危险。这些危险提出以下问题。

穷国在多大程度上可受益于技术革命?如果它们不能受益,那么这种革命只会扩大穷富差距。科学进步和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解决危及整个世界的各种环境问题;如果这种解决办法一方面与穷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与富国消费和福利倾向的限制及合理化联系起来,资本流动和市场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辅助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并提高其出口能力,其方式是促进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多大程度上可利用这种进步和全球化潜力来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处理种族冲突,解决争端并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在多大程度上可利用这种进步和全球化来增加机会以改进教育、文化和全世界文化间知识,以期在全人类中坚持和平、平等和兄弟情谊的理想。

随着第三个千年的到来,我们应审议并反省一方面人类的成就,另一方面争端、冲突和贫穷给成千上万人造成的可怕人类痛苦。我们相信,联合国是这种反省和审议的主要论坛,以便找到这些争端和冲突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巴林深信,国际社会可在新的千年期间加强其地位和价值观念,并为自己确保更好的命运,其方法是在普遍人类伙伴关系和多元化框架内实现和平、安全、团结与合作。巴林认为,这些因素对地球的生存至

关重要,并要求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因为联合国是我们的成就和愿望值得信赖的护卫者,使它可以最充分地完成其任务。我们深信,人类可以通过联合国和其它区域组织内协调与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进步、发展和增长。我们希望,新的千年将带来一个新的富足时代,世界在这个时代中将享有安全、和平与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乍得外交与合作部长穆罕默德·萨利赫·安纳迪夫先生阁下发言。

安纳迪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乍得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这既是赞扬贵国纳米比亚在捍卫本组织理想方面的贡献,又是承认你相当大的能力。乍得代表团深信,你的经验、才干和智慧将促进我们审议工作的成功。我保证向你提供充分支持及合作以完成你的崇高任务。

我还谨感谢你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机敏和巧妙地领导了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

还请允许我赞扬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功劳,他以远见、智慧、首先是耐心指导本组织,并为谋求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持续努力,尽管有各种困难而且任务艰巨。

再有几个月,我们将进入第三个千年,充满不确定、恐惧和未知情况但也充满希望的千年。这个千年的特点将是全球化,首先是人类智慧战胜自然。这将是通讯时代,我们的地球将缩得很小。这还意味着思想、知识、文化和科学流通的障碍消失。但这也将是竞争和互补的时代。

在这个世纪中,多数人的愿望是得到食品、衣物、照顾、教育、训练、住房和有酬就业。可以正当希望,下个世纪的到来将满足这些重要、基本的人类需要,我们可以避免富国和穷国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第三个千年前夕,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主要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减少会员国的贫穷状况,还远远没有实现,尽管我们在半世纪里一直集中注意这些问题。

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型聚会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和经济问题所涉的范围和迫切性,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自问这类问题呢?现在应当是考虑解决方法的时候了,这些解决方法包括以团结与合作为基础,超越事实证明有其局限性的传统合作关系的新型关系。

更具体地讨论乍得问题,我们的主要关切是通过使各个政党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以及全体乍得人民民族和解政策的充分参与性政治进程,为和平与安全创造条件。由于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了这一工作,使我国得以恢复政治稳定与社会和平,并建立符合宪法的民主机构。

我们深信,要使民主体制行之有效,就只有使其以某些共和国概念为基础,主要是公正、人权高于一切以及各地方社区参与管理其本身的事务。最近建立最高法院以及立宪委员会就体现了这种重大关切,同样,自1994年以来开展工作的全国人权委员会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些努力得到了外界的承认,并导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今年4月结束审议乍得人权局势的问题,因此,也使我国脱离了自1991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的机密程序状况。

最后,我国政府通过建立权力下放的领土行政区以及逐步转让权力,推行了权力下放政策,以便实施反映在1996年4月11日《宪章》中的乍得人民所作的选择。

为了巩固和平,加强社会内聚力,乍得政府集中注意了两个问题:军队和杀伤人员地雷。关于棘手的军队和安全问题,我国政府下了决心,保证对复员的前战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便使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并为其掌握挣得收入的技能提供支助,并保证其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关于安全问题,我们制订了一项排雷方案,应当有助于加强国家领土的安全,因为在我国领土上仍埋有大约100万枚地雷,以及数量不明的各种类型的炸药。通过这一方案,我们能够使乍得开放,特别是开放我国北部。这些危险装置的存在严重妨碍了货物和人员流动,因此也妨碍了所涉地区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我国签署并批准了《渥太华公约》,并且建立了由国家排雷事务高级专员所监督的全国性结构,以便有效地管制和处理这些致命的装置。这项方案的目标除其他事项外,还集中注意减少受害者人数,使主要公路更加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帮助流离失所者回归。

这一雄心勃勃的排雷方案所涉的范围超越我国边界,如果没有我们合作者与朋友的帮助,是无法实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谨在这崇高的讲台上再次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的声援,并请它们向我们提供帮助与合作。

在21世纪前夕,我国公民的福祉仍然是促使乍得政府采取行动的动力。这一行动的依据是自1995年以来开展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并主要集中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的经济方面。事实上,在1994年货币贬值以后,乍得重新加入布雷顿森林机构,并于1995年4月23日通过了中期结构调整方案,其资源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扩充结构调整专用资金的基础上提供的,并且由世界银行根据结构调整贷款条件提供,此外,还有我们的通常合作伙伴——法国、欧洲联盟及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的财政援助。现已实施了大胆的改革,其重点主要在于稳定公共财政,纠正对外开支不平衡,并保证可持续增长。为此目的,我们实行了与贫困作斗争的有效政策。

我国政府签署并通过了一项新的可持续行发展方案,将焦点放在三个主要挑战上:经济与财政、社会、以及政治和体制。其目的是要通过持久的结构改革,并通过有助于宏观经济巩固和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货币和预算政策来创造社会稳定的气氛。

这场消灭贫困的斗争侧重于卫生、教育、基础结构以及农业发展四个战略优先方面。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在1998年10月21日和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乍得问题第四届圆桌会议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会上认捐了大约11.2亿美元。

在这一方面,我谨最深切地感谢友好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对我们要求国际援助所作的强有力的反应。乍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值得赞扬的努力。在这次圆桌会议之后,我们举办了两次部门性会议,讨论健康以及农村发展问题。有关基础结构与教育问题会议在不远的将来也将举行。我们重申对所有有关方面的呼吁,吁请各方积极参加将分别于1999年11月和12月在恩贾梅纳举行的这两次会议。

要讨论乍得当今的经济,就不能不提到开发其石油资源问题。这是一项关键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问题,在国内外都激起了激烈的讨论。除了其在经济上不可否认的重要意外,该项目还将大大帮助分区一体化,因为它在两个兄弟国家,即喀麦隆和乍得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这些方面,我们考虑到乍得所面临的发展困难,而我们正非常谨慎地考虑我们在与石油有关问题方面的前途。乍得政府和议会已经对预计人的石油收入建立了管理与分配机制,在开发石油资源的历史上,第一次颁布了法律,以保证管理石油收入的工作的透明度,并且还

拨出这一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产油地区的领土行政区,并为子孙后代服务。石油活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应该有助于我们的预算再次逐渐实现平衡,并为我们制订一项真正的发展政策提供回旋余地。这个项目在全国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人们的希望。

我们所有人都深信,需要作出新的努力和很多牺牲来确保解决相当多会员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在继续使人类良心感到不安的其他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不良现象方面逐渐实施《联合国宪章》所庄严载入的宗旨和原则。在我们面对贫困、文盲、外国侵略、冲突、各种普遍流行病和与对环境的破坏和毒品贩运有关的跨国问题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现在已经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这些挑战将进一步增加。非洲是这些不良现象存在最多的大陆,数目日益增长的危机使我们难以同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造成我们的有限资源的减少并分裂我们的国家。

和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彼此依赖关系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乍得的情况更是如此。乍得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及其对人口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出于一种责任和国际义务感,我国为那些成为彼此共处所固有的问题的受害者的其他非洲国家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巨大牺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参加了中非分区域的各种维持和平行动。在这方面,我满意地回顾绿松石行动。乍得参加了这次行动以便在卢旺达拯救生命。乍得还参加了班吉协定执行情况非洲监测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后者谋求在中非共和国政府与叛军的一部分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它导致不同观点之间彼此妥协并为组织多党选举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同样的精神,我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干预。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的干预使局势转向稳定并促进了交战各方之间的对话。由于在1999年4月18日签署了《西尔特协定》,乍得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其部队。冲突各方之间签署的卢萨卡停火协定为那个兄弟国家的人民展开了新前景。乍得希望,安全理事会所支持的该协定将导致该国和整个大湖区的最终和平。乍得将支持这个进程。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悲剧没有使我们忘记刚果共和国的局势,该国最近处于分裂的边缘。现在,过激的情绪似乎正在让位于理智。我们欢迎刚果政府和各反对党所表现出的意愿,它们已作出明智的决定,通过谈判在该国恢复和平。乍得欢迎和鼓励这种积极的情况发展。

在这个相当严峻的画面中,我们必须加上安哥拉的脆弱局势。在那里,内战已在全国恢复。这是整个非洲所非常关切的,特别是因为敌对行动的恢复无疑将意味着所有方面为在这个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家实现和平而作出的大量努力归于失败。从而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协助在这个受伤的国家恢复和平。

我们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在西非实现和平与安全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这些努力导致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签署停火协定。参与这些危机的各方应实行克制并为其人民的更高利益而争取实现和解。

关于非洲之角,我们注意到,在索马里的冲突各方寻求能够导致该国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意愿方面没有出现明显的进展。我们欢迎胡斯尼·穆巴拉克为通过谈判解决这场危机而作出的努力,但我们也呼吁索马里领导人协助在该国恢复和平。我们对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之间恢复敌对行动感到遗憾,这种行动已导致大量的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我们敦促在交战各方之间进行了调解工作的所有方面坚持下去,以便结束使已经令人严重不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这些敌对行动。

乍得欢迎安全理事会解除对一个与我们更邻近的国家,即伟大的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的禁运。我们敦促永久地撤销禁运;禁运严重地破坏了那个邻国的兄弟人民的利益。

在所有大陆中,非洲似乎由于经济危机和战争以及其他冲突局势而受苦最重。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于中东局势,以下一点已经得到确立:巴勒斯坦问题是这场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于对奥斯陆协定的实施,特别是所有方面对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完全遵守。这个问题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可信性。随着以色列新政府的上任,产生了对今后前景的新希望。乍得鼓励各方共同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在其他地区,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冲突和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阻碍着最终恢复和平。我们呼吁过去的交战双方表现出责任感,以便为恢复完全的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巴尔干地区,乍得鼓励国际社会为在该区域,特别是在科索沃恢复和平而作出的努力。在东帝汶问题上,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完成在联合国主持下所开始的进程,以便结束那里人民的痛苦。

在亚洲,乍得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及其2千2百万居民的命运感到关切。在世界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它能够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乍得支持接受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以纠正一种不公正的情况。

众所周知,一些冲突产生于无控制的军备竞赛。在这方面,小型武器在非洲的流通、扩散和非法贩运使我们感到关切,特别是因为这种产生于冷战结束和该大陆的很多冲突的现象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情况。如果不很快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各国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将受到不断的威胁。

为了处理这种情况,将于乍得举行一次由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主持的关于小型武器和毒品贩运问题的会议;随后将立即举行该委员会的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将于1999年10月25日至30日在恩贾梅纳举行。乍得有幸担任该委员会的东道国,并将尽全力确保其工作的成功。

联合国是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历史范畴内成立的。它一直是并仍然是更紧密地聚集人民和想法的地方,它的存在帮助避免了不少一次的灾难。但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改变了,冷战的巨大争斗已经消失,让位于一种仍在寻找自己的国际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各会员国除管理自己的事务外更强烈地要求参加管理国际事务。因此,必须调整联合国的结构使之适应当前问题的新范围,这需要平等分担国际责任;这种责任再也不能只是少数国家的垄断,无论它们有多么强大。

要对这种关注作出答复,就必须改革安全理事会。乍得在此衷心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即安全理事会中必须有非洲大陆的平等与合法的代表权。

对于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必须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各国将平等地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经济全球化显然会有在世界贸易中消除所有歧视性和不公平作法的优势,但是必须认识到:南方各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使它们无法充分从中获益。此外,无约束地开放市场以及缺乏加固某些收益的措施的情况,正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并使之在世界舞台中处于边缘地位。

同样,这些国家的债务给它们微薄的预算资源加上沉重负担,抹消了它们所有发展努力。我欢迎七国集团最近在于德国科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减轻债务负担沉重的穷国的债务的决定。这种行动值得赞扬,但仍然是不够的。乍得敦促富国进行更大的努力,以使穷

国能够最终应付外债负担,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下面请不丹王国外交大臣吉格米·约塞尔·廷利先生阁下发言。

廷利先生(不丹)(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将以你广泛的经验和非凡的才干,指导我们处理完我们面前的一系列艰难问题。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与支持。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迪迪埃·奥佩蒂先生阁下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的领导和贡献。

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地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在大会二十世纪的本次最后会议上,联合国大家庭又增加了三个成员而扩大,是恰当的。我们期望它们将为本组织作出宝贵贡献,并期望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与它们密切合作。

本世纪或许出现了文明史册上最大的变化,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到社会思想和组织的进步。然而,我们继续看到冲突和毁灭能力的扩充所产生的最可怕的破坏形式。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诞生,反映了各国人民和平与和谐生活的要求和愿望。在本千年结束之前的大会本次最后一届会议上,我们有责任考虑联合国是否达到了崇高理想及其所有成员的期望。

联合国的主要目标,是根据国际法及各国主权平等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尽管联合国从一成立就迅速承担起这一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但其效力并非最佳。冷战的结束带来新的希望和期望,并使人们重新为履行这一责任努力。任务是复杂和困难的,有时对某些问题的果断行动使我们质问其他人为什么无所事事。我们认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制必须利用旨在和平解决分歧的早期对话。必须极为慎重地考虑利用武力解决冲突;这种作法必须完全在国际法律的范畴内,而且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尽管安理会必须具有迅速行动的灵活性,然而它或其个别成员绝不能孤立行动。安理会必须对广大国际社会负责,必须响应我们对于一个更具代表性、更有意义和有效的组织的集体愿望。

不丹赞同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即必须通过安全理事会在其组成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改革而反映新的全球现

实情况。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呼声的合理性,必须体现在增加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数目方面。我们相信,将在已确立的大会机制框架内、在各会员国的参与下并以持续的透明度而展开有关该问题的审议。

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常规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并未削弱。只有顾及各国的合理安全关注并对最终消除所有这种武器作出坚定承诺,才能取得核裁军的进展。我们认为,还必须同样注意管制全球常规武器和小型武器的贸易。

恐怖主义仍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局势中危及和破坏人权、基本自由与安全。现在迫切需要更加优先地制订一项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面公约。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以便预防、打击和消除这个祸害。

全球化给持久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自相矛盾的是,在迅猛变革和调整进程的同时,贫穷、失业和社会迷失方向情况更为严重。有人担心目前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会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受到排挤,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明确表明迫切需要统筹兼顾,以便形成全球化进程的适中道路。

我国欢迎八国集团在1999年6月科隆首脑会议上决定减轻负债沉重穷国的债务负担。我们希望,有效执行这项决定将大大支持国内努力,以便把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减至更有能力还本付息的水平,并为其开辟真正持久经济增长的机会。

虽然我们赞扬那些达到和超过商定官方发展援助目标的发展伙伴,但令我们遗憾的是,除了几个例外,对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目标的长期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在这方面,不丹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强调,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召开一次筹措发展资金问题的高级会议。不丹承认,各方都必须为培养成功的发展伙伴关系作出同样努力,但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日趋边缘化令不丹越来越感到关切,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仍低于0.4%。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已采取经济自由化和体制改革步骤,但仍需通过提供优惠的市场机会和协助建设体制能力和发展基础设施,为其顺利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便利。在这方面,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表现的普遍关心和富有同情心感到欣慰。

不丹作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大家庭的一个创始成员,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南亚合作,南亚无限广泛的资源和潜力仍处于闭锁状态、尚未得到开发。我们已在促进合作、尤其是社会领域的合作方面,并在加强核心经济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进展。特别重要的是,我们

已承诺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便使南盟能够在合理期限内从最惠贸易安排迈向自由贸易安排。

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是联合国压倒一切的首要责任之一。几十年来,虽然人们有时把联合国各机构的贡献视为理所当然,但这些贡献十分显赫。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贡献,并给它们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使它们有效地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

不丹一贯谋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进程。我国的发展战略永远旨在使全体国民更加幸福,而不是仅仅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不仅要求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求通过维持和促进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保护和养护我们脆弱的山地生态系统并通过加强和实施廉政,以通盘方式丰富人民的生活。

为了谋求物质和精神发展之间的平等均衡,政府在过去40年中一直给社会服务分配大量资源,几乎30%的现行国家预算都分配用于提供免费基础教育和初级保健。由此使得我国的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入学率也在上升——不丹人的平均寿命在20年中提高了20年。

我们意识到,均衡发展并非总是最容易采取的路线。它需要大量的深思熟虑、慎重的态度和对谨慎道路的审慎选择。它需要耐心、克制、的确也需要勇气:即为取得长期收益多年坚持不懈的耐心、对短暂冲动的克制和自我控制以及为长期持久发展牺牲眼前利益的勇气。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会的许多优秀成员和各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机构在我国努力确保进步和持久全民幸福过程中给予激励、合作和有意义的支持。

下午1时散会